

◀（上接 4 版）

时间也大大缩短，相关申请费用降低 80%；印度政府还宣布，创业公司成立后最初 3 年内无须交税并免受劳工法律的审查。

在“创业印度”计划的推动下，印度已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最火的创业热土。许多互联网公司和投资机构闻风而动，纷纷抢滩印度市场。以班加罗尔为核心区域的印度创业生态圈生机勃勃，被视为“创业印度”的代名词。以前这里是众多科技公司的外包中心，而现在这里已升级成为各大公司的研发中心所在地，像 Twitter 和小米都在此建立了研发基地。在“创业印度”热潮的推动下，这座拥有 1000 万人口、被称为“亚洲硅谷”的城市正经历着“二次崛起”。

快速的资本聚集使得班加罗尔成为了全球吸引技术投资最多的城市之一；在人才方面，这里不仅云集了印度本土培养的高科技人才，还吸引了大量“海归”，编程人才数量仅次于美国硅谷。伴随着资本和人才的集聚，不少印度创业公司已成长为“独角兽”企业（即市值或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私营创业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电子商务、移动软件服务、互联网软件服务等领域，包括全球第二大移动广告公司 InMobi、印度电商巨头 Flipkart 和 Snapdeal、获阿里巴巴注资的印度最大移动商务平台 Paytm、印度版的滴滴打车 Ola、印度版的今日头条 NewsHunt 以及在线医疗网站 Practo 等。

“智慧城市”战略(Smart Cities Mission)

长久以来，印度政府的政策主要注重改善农村地区条件，而基本忽略了城市地区的发展。这种“重农村、轻城市”的偏向性政策主要受到倍受尊崇的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影响，他认为，“真正的”印度存在于乡村中，城市则是腐朽堕落、外国势力汇聚的堡垒。

在被政府忽视了数十年之后，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远远落后。40 年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贫穷的国家面临类似的经济状况：大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且自然资源匮乏。1980 年，印度的城市化率为 25%，比中国的 20%领先一步；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 53%，而印度仅略微增长至 32%，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将印度远远抛在后面。除了城市化程度较低，印度城市中的贫富差距也非常严重——豪宅与贫民窟一街之

隔、富豪与乞丐比邻而居。印度 12 亿人口中有将近 6500 万生活在贫民窟，而且这一数字随着印度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降反增，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城市惊人的高房价，一份全球主要城市房价与工资水平的分析报告显示，印度普通民众需要工作长达三个世纪才能在孟买市买得起一处普通住宅，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房价让当地人最负担不起的城市。

总理莫迪对城市的看法不同于以往的印度领导人，他认为，“当今世界，相互竞争的已不是国家，而是城市”；城市是汇聚创业活力的中心，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还可能帮助民众摆脱贫困。当选总理后，莫迪把推进印度城市化进程放到了政策制定的优先位置，一方面，印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计划在五年时间里向 500 个印度城市提供约 75 亿美元资金，用于投资清洁饮用水、下水道系统、公共交通以及公共空间等基本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莫迪政府启动了“智慧城市”计划，推行以“智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化战略。

“智慧城市”战略，计划在全印度建造 100 座智慧城市，在大多数邦建立至少 2 个智慧城市。印度政府将为智慧城市提供基本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工具、网络连接和电子政务体系等，鼓励公共私营合作(PPP)模式、金融公司和 IT 服务企业参与该计划。据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行业协会(NASSCOM)预测，印度“智慧城市”战略将重点在智能建筑、智能医疗、智能交通等领域开展建设，预计在未来 10 年可为 IT 产业带来 300 亿至 400 亿美元的商业前景。包括爱立信、诺基亚、华为和思科在内的全球各大通信设备厂商都在为印度的“智慧城市”战略提前布局。

税收制度改革

为了使“印度制造”、“创业印度”等计划顺利实施，莫迪政府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印度原有的税收体系特别复杂，分为邦内税、中央税以及邦际税，中央与地方重复性征税的问题比较严重；此外，由于印度 29 个邦对各自管辖内的企业实施不同的税率和税法，这使得印度市场的条块分割特别严重。

2014 年 7 月，莫迪政府正式提出印度独立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愿景，即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商品及服务税税收体系(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以改变一直以来分散混乱且税负过高的税收环境。2016 年 8 月，GST 法案终于在国会联邦

院获得朝野共识、正式通过。税改后的 GST 将取代目前的消费税、劳务税、增值税、入市税、过境税等而以单一税制代替。GST 预计将在 2017 年 4 月开始实施，届时将能大幅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简化税务系统、降低跨邦经商成本，让印度成为真正的大型单一市场。

GST 税改被称为印度自 1947 年独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税制改革，并将成为“莫迪新政”的里程碑之一。税改将为印度未来的发展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政治上，莫迪政府的公信力将大大提升。近年来，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面临分裂的趋势，如英国脱欧及欧洲其他国家民粹主义抬头引起欧洲的分裂、特朗普当选总统引起美国社会的撕裂等。相比之下，印度朝野在此次税改问题上放弃争吵，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或将成为莫迪执政生涯的一笔重大政治遗产。正如莫迪所言，GST 税改是“迈向政治透明的伟大一步”、“印度实现团结的伟大一步”。经济上，GST 实施后将降低印度的物流成本与货物库存成本，促进区域间商品流通，提高印度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促进出口。据估计，GST 的实施或将使印度的 GDP 增加 1%–2%。

“闪电废钞”与“莫迪式反腐”

2016 年 11 月 9 日，在一次并未事先通知的电视讲话中，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了一项令全国惊愕的政策：废除面额 500 及 1000 卢比的纸币，现有纸币必须在 50 天之内存入银行或兑换为新币，否则将沦为废纸。由于印度 90%的交易都是通过现金完成的，这场“闪电废钞”运动一下子让占印度货币流通总额 86%的现金变成“废纸”，一时间，大批印度民众挤爆了邻近的银行网点，自动取款机的队伍也排到了大马路上。印度央行 12 月发布报告显示，由于对现实情况预计不足，此前印刷的新钞不及民众实际需求的 1/10，这令现金交易为主的印度经济开始受到影响。

“废钞行动”来得如此突然，给商业活动和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也招致许多批评。分析师们也认为，废钞后的两个季度印度 GDP 增速可能会因此下滑超过一个百分点；惠誉评级公司也因此将 2016 年度印度经济增长的预期从 7.4%下调到 6.9%。

尽管负面影响无法避免，莫迪政府声称这是一场对黑钱、腐败和假币发起的“闪电金融战”，只有“闪电废钞”才能解决印度社会长期以来的顽疾，才能让印度经济长远受益。这

项行动也是“莫迪式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

莫迪是印度为数不多的从未卷入过贪污丑闻的政客之一，他宣称自己既不腐败、也不需要腐败利益——“独身一人，我能为谁贪污腐败呢？”莫迪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反腐措施，展现了他政肃治理、深化改革的决心。这些措施包括：2014 年 6 日，印度政府下发被誉为“莫迪 11 条戒律”的文件，旨在敦促公务员精简办事流程、清理陈旧政务文件以及设定明确工作目标，以期整顿公务员队伍，除掉“蛀虫”；为紧缩开支，莫迪政府禁止所有官员乘坐飞机头等舱、在五星级酒店开会及买公车；2015 年，莫迪顶住保守派的压力，宣布砍掉已有 65 年历史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把权力转移到财政部。

莫迪政府还启动了一项让国有银行为穷人开办帐户的活动，希望借此提升扶贫力度，同时铲除腐败的温床。莫迪说，为穷人开办银行帐户，不仅能让穷人“有机会接触银行和信贷机构，让他们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还可以作为反腐的利器”。因为政府将要求有关部门经由银行帐户直接将福利和工作报酬等款项支付给个人，这笔钱将不再由地方政府代为分发，这样就避免了地方政府截留款项而诱发腐败行为。为鼓励更多人办理帐户，印度政府还为每个账户所有人提供 10 万卢比(约合 1650 美元)的人寿保险。另外，当这类帐户内没有钱时，银行也不会收取“管理费”。

佛教外交

莫迪将外交比作经济发展的侍女。为了引进更多的外国投资，除实行诸多相关政策措施以改善投资环境外，莫迪政府还积极地与各国进行对外交往。在就任总理后的 1 年多时间里，莫迪访问的国家总计达 20 多个，是前总理辛格的 3 倍。莫迪政府试图通过大国外交，加强与美国、日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等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联系；通过周边外交，加强同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通过推进“东向行动”，加强同韩国、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通过能源外交，加强同伊朗、沙特、科威特、哈萨克斯坦等中东、西亚和中亚石油输出国家的经济联系；通过加速西进行动，进一步加强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

在对外交往中，印度政府十分重视宗教、艺术和文化等软实力的影响作用。印度前外长亚什万特·辛哈曾说，“瑜伽、美食、

音乐、电影、时装、舞蹈、文学等让印度走在全球化浪潮的前列，并为印度赢得远在天涯的新朋友。”莫迪上台以后，除了加强与各国的经济交往，也将宗教、文化作为印度与各国接触的重要媒介、向世界讲述印度独特的动听故事。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东亚和东南亚盛行，这种文化联系成为连接印度和亚洲国家的天然纽带。莫迪认为，佛教可以作为印度与亚洲各国关系中的“粘合剂”，有助于唤起亚洲各国对印度的记忆并转变为印度的外交特色、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佛教外交”可以赢得周边国家的人心、可以巩固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莫迪上任之后便任命印度著名的宗教学者罗凯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为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印度外交部的一个独立机构，这表明莫迪对其宗教理念的重视。该委员会曾邀请少林寺方丈访问印度参加佛教学术会议，并向中国僧侣访问印度寺庙提供旅行签证，在新德里举办中国佛教绘画展，邀请日本首相出席佛教活动等。

除此之外，莫迪在访问亚洲国家时也通过强调彼此之间的佛教联系来拉近彼此的距离。莫迪在 2014 年访问日本时将拥有悠久佛教渊源的京都作为第一站。在访问中，他参观了始建于 1397 年的金阁寺；2015 年 3 月，莫迪访问韩国，佛教自然是其外交的表达方式之一，他提到了一位从韩国去印度学习的僧人，他的足迹遍布当时印度的五大王国；2015 年 5 月，莫迪访问中国，他将古城西安作为访问的首站，并主动提出参观有 1700 多年历史的大兴善寺。在隋唐时期，有来自印度的僧侣曾在此寺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莫迪参加了诵经仪式并在该寺庙留言，向传播佛法的僧侣致敬。之后，莫迪还参观了大慈恩寺、登上了大雁塔，中印两国家喻户晓的玄奘曾任该寺住持。善于挖掘文化、宗教等软实力进行外交已成为“莫迪新政”的一大特色。

印度是一个从来不缺乏发展理念和发展梦想的国家，无论是尼赫鲁“有声有色的大国梦”，还是经济改革之父曼莫汉·辛格推动的“世界经济强国之梦”，似乎都已随着印度经济发展的波折起伏而声势渐微。如今，莫迪再一次展示了重塑“新印度经济梦”的雄心壮志，“莫迪新政”到底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